

热河胡匪与我当胡匪的经历

目 录

前言.....	(1)
一、我出生前后的热河南部蒙旗社会.....	(1)
二、热河胡匪与我当胡匪的经历.....	(16)
三、有关“蒙匪”和巴布扎布的见闻.....	(53)
四、日寇侵占前的热河地方部队.....	(63)
五、奉军与国民军战争中我随奉军进攻察北的 回忆.....	(86)
六、我镇压嘎达梅林起义部队的经过.....	(94)
七、我是怎样从“马贼”到汉奸的.....	(99)
八、我率伪军在察北的罪恶活动.....	(126)
九、日寇统治伪蒙的策略.....	(155)
十、伪蒙政权内幕.....	(173)
十一、“蒙古军”成立初期的情况.....	(200)
十二、“蒙古军”的发展变迁.....	(237)
十三、“蒙古军”的战斗表现.....	(249)
十四、“蒙古军”腐化堕落的情况.....	(259)
十五、我是怎样掌握“蒙古军”的.....	(270)
十六、德王如何操纵“蒙古军”.....	(281)
十七、日寇控制“蒙古军”的方法.....	(290)
十八、随德王访问日本和伪满情况.....	(299)
十九、我参加汪精卫召集的“青岛会议”经过.....	(320)
二十、冈村宁次召开的一次华北伪军首脑会议.....	(324)
二十一、白凤翔投敌经过.....	(327)
二十二、德王处死吴相文的侧闻.....	(331)

- 二十三、我和吴佩孚有关联的几件事.....(333)
二十四、我和德王由张家口溃逃的狼狈相.....(336)

附 录

- 李守信的晚年.....刘映元(349)

我出生前后的热河南部蒙旗社会

在内蒙古近代史上，我是一个相当典型的反面人物。从我初给土默特右旗的喇嘛旗官充当“炮手”（卫士），继给热河游击马队的统领、管带担任差官，于一九二一年升为奉军的营长，一九二六年编为热河军的团长，一九三三年跟随东北陆军第十七旅旅长崔兴武投降日本，进犯察北六县，其后又利用“七七”事变前后华北的政治形势，一跃而为伪“蒙古军”总司令达十年之久，抗战胜利以后又投靠蒋介石，参加反革命内战，全国解放前夕，又由台湾返回内蒙西部继续与人民为敌，最后成为罪大恶极的战争罪犯。这近四十年的复杂经历，真是臭名昭著。我的反动本质真是冰冻三尺，绝非一日之寒形成的。说来话长，下面先从我的家乡情况，阶级出身谈起。

我于一八九二年七月十一日（光绪十八年壬辰前六月十七日），出生于内蒙古卓索图盟土默特右旗的一个蒙古小地主家庭。我家居住的村子叫古力古畜（音台）大庙，归热河承德府朝阳县第七区管辖。它位于牻牛河东岸，南距朝阳县城一百八十里，北距土默特右旗黑城子王府九十里，从那里往东再走三十里，便是以后划为阜新县的土默特左旗。热河蒙古有好几个部落，分别在两个地方会盟，南为卓索图盟，北为昭乌达盟。清朝光绪初年，这两个盟以辽河上流的老哈河和西拉木伦河为界。老哈河南岸是农业区，西拉木伦河北岸是牧业区；老哈河和西拉木伦河的中间地带，大多是半农半牧区。到了一九二四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前后，因为各旗相继放垦，在设治开鲁、林西、林东、围场、经棚之后，又设治了鲁北（即今扎鲁特旗所在地）和天山两县，因而老哈河北岸基本上也成了农业区，西拉木伦河的北岸也

变成了半农半牧区。

卓索图盟由两部和两旗组成。两部是西南的喀喇沁部与东北的土默特部，两旗是土默特部东北的唐古特喀尔喀旗与锡埒图库伦旗。喀喇沁部分为左右中三旗，和古北口北面的长城接壤。土默特部分为左右两旗，和山海关外的柳条边墙毗连。这两部的蒙古人，很早就接受了汉族的文化影响。土默特部来源于现在的呼和浩特附近，故又称为东土默特部。据说在明朝嘉靖年间，有两家贵族领着一帮奴隶从俺答的统治下逃出，跑到这个临近海滨的高山深沟地带游牧，过起“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掉进饭锅里”的狩猎生活。土默特部于满清入关以前，就投降了满清，被编为左右两翼。

土默特右旗在康熙年间，便有口里的汉人移入。少数是跟着公主、郡主下嫁而来的、称为“八大匠”的北京工匠，多数是贪图高额利润和种地不纳粮而来的山西商贩与山东农民，其中不少人跟蒙古妇女结婚而入了蒙古籍。土默特左右两旗，右旗在左旗西南，紧靠山海关外的锦州、义县和开化更早的喀喇沁部。这个旗在乾隆初年为塔子沟的东境，以后又在该旗的三座塔地方设治了三座塔厅，即后来的朝阳县。朝阳县城里，有一座康熙年间建造的喇嘛庙——朝阳县佑顺寺。在建庙之前，那里就有了直到“九·一八”事变时仍然存在的山西人所开设的“三泰号”商店，故朝阳有“先有三泰号，后有喇嘛庙”的乡谚。可见土默特右旗在距今二百多年前，蒙汉民族就开始杂居了。蒙民里有姓鲍和姓乌两家贵族和姓白、姓高、姓戴等家奴隶。由于他们的祖先来自呼和浩特一带，被当地人称为“真蒙古”，其他姓李、姓王、姓张和姓周等家奴，因为他们的祖先系娶蒙古妇女而入蒙古籍，均被称为“随蒙古”。土默特左旗在右旗东北，和汉族居住的地区，不像右旗那样临近，要晚开化好几十年，所以又称为“蒙古真旗”。

我们古力古奭大庙的李家是“随蒙古”。我的祖先是山东济

南府长清县李家庄人，单身跑来土默特右旗给蒙古人种地。后来被主人招为养老女婿，入了蒙古籍，成了“随蒙古”（我父亲曾和朝阳寺村的汉户李家联过宗）。不过，以后我们好几辈子再没有和汉族通过婚，我的祖母、嫂嫂和我的元配女人，都是天足，会说蒙语。

最初移居牧区的汉人，都依附于蒙古人。正如农业地区的少数民族，遭受大汉族主义的压迫一样。游牧地区的汉族人民，也遭受地方民族主义的欺侮。据说，初到牧区的汉人如果不入蒙古籍，可以说动辄获咎，除了砍柴不许越界，牧养不准出圈，并且有蒙古的地痞流氓，随便闯入汉民家中索要酒食。所以在土默特右旗不只有单身汉人赘蒙家的汉人，也有全家入了蒙古籍的汉户。这是清朝康、雍、乾三朝时的情况。以后由于蒙民掌握了农耕方面的生产技术，奴才不堪贵族压榨，亦有“出旗”逃跑到汉族的村庄，入了汉籍的蒙人和蒙户。在我能记事的时候，热河南部只有蒙汉上层人士在制造民族分裂，一般蒙汉劳动人民，都能相安无事和睦共处。

土默特右旗设治三座塔厅即后来的朝阳区之后，口里的汉人大量涌入。这些汉人的阶级成份非常复杂，不仅有劳动者和商贩，也有匪盗与封建会道门分子，以及逋逃的罪犯与失意而有野心的文人。就是在劳动人民里后来也分成两极：有的成了地主和开设“烧、当两行”的财东；有的成了贫雇中农和手工业者。农民非常封建保守，不像牧民那样轻易流动，在一个地方住久，便产生了“热土难离”的感情。牧民定居下来变成农民以后，也是如此。

民国初年我刚当兵时，开到西喇木伦河以北的林西和开鲁驻防，那里把种籽扔到犁过的地里，不用锄耩就可以生产出“成亩打石”的粮食，可是人烟非常稀少。而我的家乡土默特右旗，早把高山变成了梯田，用毛驴驮粪在好多炕大的小面积土地上施肥。据一九二七年调查，朝阳全县的人口已达到六十五万四千余

口，绝大部分是汉族农民，不论是“真蒙古”和“随蒙古”，合计起来也不足一万人。此外还有极少数回民。在朝阳县城以南，蒙古人多系土默特左右两旗和喀喇沁部不堪王公贵族压迫的“逃户”。他们改名换姓潜居到汉族的村庄，给汉族地主佣工受苦或饲养牲畜。县城以北凡是川口地方，多系以蒙古人为主的村庄，称为某某营子，山沟里完全是称为孤家子、两家子以及三十家子与五十家子的汉族村庄，表现出一种人稠地窄的状态。

朝阳是热河人口密度最大的一个县，以来自山东的移民占全县人口的多数。这些山东移民把山东的各种风俗，完全搬到土默特左右两旗及敖汉部与奈曼等旗。在热河，朝阳人多好斗勇，特别是朝阳城南羊山、铎子沟、二十家子和松树嘴子一带的农民，表现更加突出。有些人因不满王公、地主的压迫，愤而起事；也有的因贫困无着，散而为匪。尤其朝阳境内尽是大山深沟，牝牛河日夜吼叫，所谓“山高水暴出刁民”和“险固足以自守”，越发成了生长胡匪的窝穴。朝阳县城不只一次被“暴民”和胡匪攻破，故有“久反朝阳”之称。朝阳最初的土匪，是朝阳寺附近头道营子根顿召的几个喇嘛。他们在道光年间便跑到柳条边墙东边的奉天境内抢掠，人称为“马鞑子”。以后回子沟的回民韩三、韩四弟兄，也跟着蒙古喇嘛效尤。到了咸丰初年，就有称为“教人好”的胡匪在朝阳境内出现，开始了绑票。接着关东奉天、吉林的胡匪（内中有科尔沁部白凌阿率领的蒙匪），不断闯入朝阳。朝阳的地主阶级组织起民团，城里的商户设立了铺勇。同时因为土默特右旗和敖汉部均发现了金矿，朝阳本地也出现了私开金矿的“金匪”。在英法联军把咸丰皇帝从北京撵到热河的那年，有冀东昌黎县秀才柴宝善，鼓动朝阳金场沟的“金匪”李凤奎称帝，于阴历二月初二日攻入县城，其母穿戴着戏班的风冠霞帔招摇过市。与此同时，土默特左旗蒙民因王公差丁过重，由恩合巴图等组织“老头会”进行反抗，将阶级斗争转化成民族仇杀，也进入朝阳县境焚掠。

上述这些都是小的骚动，大的变乱是一八九一年（光绪十七年）金丹道的起义，和一九〇〇年至一九〇一年（光绪二十六年至二十七年）二十家子和铍子沟“联庄”打松树嘴子天主教堂的反帝斗争这两次重大的历史事件。

金丹道起义，发生于敖汉旗，后来波及到喀喇沁和土默特左右旗。朝阳的蒙汉人民称金丹道徒为“学好”，可能是这些道徒仿效胡匪的行径所致。因为关东和热河的胡匪首领多以“好”字为号。如前述咸丰年间在朝阳扰乱的“教人好”，以及后来张海鹏部下的王永清叫“天下好”等等。金丹道起义时的政治口号是“灭清扫胡”四个大字。这是由于蒙古王公、旗官压迫汉人，金丹道徒利用这种情况而挑起了事端，聚众攻打敖汉旗贝子府。

大汉族主义固然能给少数民族带来灾难，一些地方民族上层也极力压榨各族劳动人民。“九·一八”事变以前我在开鲁和林西驻防时，还听说迁入科尔沁草原种地的汉人，一旦发家致富之后，即有被当地的牧主和大喇嘛派人把全家屠杀的危险。巴林左、右旗中间有个蒙古豪强×××，他住在大草原中间一个单独的大院，到那里投宿的汉族商旅，只要行囊沉重，也有永远失踪的危险。

敖汉贝子兼昭乌达盟盟长府邸被金丹道徒包围烧杀时，唯一逃脱的是他的一个孙子德松坪，人们称为“老德王”（热河人称西苏尼特旗的德穆楚克栋鲁普为“小德王”）。此人于我当了军官之后，和我变成称兄道弟的朋友。据他亲自和我说：他家居住的上府街北面十五里，有一座东西二百里、南北五十里的大黑山，埋有康熙皇帝嫁给翁牛特部和喀喇沁部的两个公主，所以称为东陵和西陵，蒙古王爷就借此严禁汉人入山砍柴。有一次一个砍柴人被敖汉贝子府的兵丁衙役逮捕，用树杈插入肛门扔到空中处死。金丹道首领、建昌县医生杨彦春和齐老道等，便以此挑动起民变。他们除烧杀了敖汉贝子府和附近所有的蒙古村庄和人民，并于是年阴历十月十二日，攻入朝阳县城。后经佑顺寺喇嘛潘成

连夜骑马跑到锦州告变，由一八九四年“甲午战争”死于朝鲜平壤的那个左宝贵，率领马步三营军队开到热河始将战乱平定。

到锦州搬兵的潘成，就是我曾给充当过“炮手”的罗旺喇嘛的师父，即在热河很出名的周仓喇嘛，拉扯起来还是我的师祖。因为金丹道徒看见蒙古人“格杀勿论”，敖汉部白塔庙出了一个三喇嘛，也因替父报仇，聚众惨杀起汉人来。这样民族间互相仇杀的结果，把敖汉、喀喇沁和土默特的好多蒙古人，都逼得跑到科尔沁部，谓之“跑学好”和“躲学好”。汉人被杀据说有三四万人，双方的财产损失更无法估计。战乱过去以后，朝阳、建昌北部出现了好多无人的村庄。清廷曾发给每人三串朝阳“塔帖”，对蒙古人进行过赈济。我父亲那时扔不开家业，把妇孺们寄藏在山上，他一个人留在村子里看门，钻到灶火的炉坑里面，用头顶起铁锅瞭望外边的动静，他曾看见从敖汉部退往阜新县的“学好”，从我们村边整整过了一天一夜。官兵追了上来，他们发出“逮逮逮”和“杀杀杀”的喊声上去包围。因为“学好”们尽拿着土枪刀矛而缺少快枪，最后剩下一万七千多人，都被左宝贵的军队兜围到我们村东一条名叫“寻死沟”的深沟中完全歼灭。

我是“跑学好”的第二年所生，当一九〇〇年义和团掀起反帝斗争时已经九岁。朝阳义和团攻打的是天主教东蒙古教区主教所在地的松树嘴子，那里在朝阳县城东南。朝阳县南北长达七百余里，松树嘴子和二十家子、铍子沟一带，距我家有三百多里，故未被战争波及。朝阳县东南事态闹得很大。铍子沟和二十家子的地主，早已建立起联庄的组织；而松树嘴子的地主武装，有比国神甫给弄来的洋枪，把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势力结合在一起，这两方面经常发生摩擦。当时，铍子沟和二十家子的“联庄”，由朝阳庠生邓云成（字莱峰）领导，在义和团攻打松树嘴子教堂时，“联庄”没有派人直接参加，只供给食宿和借给火枪等武器。就是这样，当天主堂从奉天把俄国军队调来，将义和团击退以后，便向松树嘴子以西的蒙汉人民展开了报复性的焚掠。

除火烧永顺寺和云楼寺等蒙汉召庙外，还进入朝阳县城劫狱，沿途奸淫烧杀，无所不为，因此激起朝阳广大蒙汉人民的义愤。

天主教徒和俄国兵攻打二十家子时，邓云成叫“联庄”退让，最后天主教徒和俄国兵包围铍子沟时，邓云成才决定抵抗。因为“联庄”那时也有了八厘米快枪，又加民团义愤填膺，在沙皇军队和汉奸洋狗的面前，抵抗得非常英勇，所以铍子沟始终未被攻破。一直从一九〇〇年秋天支持到一九〇一年夏天，由直隶提督马玉昆亲自前来调停才停战。天主教堂斗不过“联庄”，却利用法、比等帝国主义向清廷施加压力，而邓云成表现出地主阶级的投降妥协性，以为事情就此罢休。不料是年初冬，清廷把宋庆的毅军调来，对铍子沟“联庄”按暴民进行了剿除。邓云成和他弟弟邓云祥及儿子等，突围出去跑到柳条边墙的清河门，被追兵杀死，方使松树嘴子的外国神甫消了气，将这一风波结束。

扎鲁特部放垦设治为开鲁县以后，朝阳好多农民都搬到那里种地。我的朋友张秉彝（字子良，朝阳照星沟人），曾任赤峰商埠交涉员和开鲁县长，在那里购买了好多土地，他的儿子张念祖是开鲁的大恶霸地主。在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时，还率领当地的民团，缴过进入东北的苏联红军的武器，得了不少转盘机枪。

朝阳在我出生前后，差不多年年有战乱，因此几乎家家有武器，人人都会骑马打枪。加之当地赌风很盛，到处有赌场，好多青年因为输干要光，逼得当了胡匪。我住的那个第七区，有两班一百二十多人的“京梆子”剧团，春夏秋三季经常在各村巡回演唱。天不落雨唱“祈雨戏”，天要落雨唱“谢雨戏”，无非是利用庙会聚赌，绅士和军警借给戏班抽价向“宝棚”领钱。至于地主人家，一遇刮风下雨就开局，掌柜的把伙计们的工钱，完全用“宝盒子”扣入自己的腰包。这种现象不仅是朝阳如此，我在经棚驻防时，看到西拉木伦河北岸的乡下，赌风比朝阳还厉害。那里有一个当乡约的刘祥兆，是一个白手起家的大地主，也用“宝盒

子”和其他方法剥削长工，以致给他受苦的人负债累累，成了他的不吃草料的牛马。朝阳因设治已久，不像北边那样“开放”，但是赌毒和烟毒，可以说遍地皆是。至于各部的蒙古人，用一种染有红白颜色的牛骨头作为赌具，也赌得很凶，以致不少人倾家荡产。热河的锥子山盛产鸦片，共有四五个品种，到了天气上冻时，还割不完烟浆。锥子山的鸦片行销热河各旗县。各旗县也多种植此种毒品，使许多人沾染上不良嗜好。民国初年，日本人又从奉天方面给热河输入金丹和吗啡，毒性比鸦片还要强烈。这样赌博添上烟毒，把不少劳动人民胁迫进胡匪里。我家东南八九十里地方，有一座广岭山（亦称翳巫吕山）便成了关东和热河的贼窝。广岭山东是张作霖的老家黑山县；广岭山西有汤玉麟的故乡阜新县骚虎营子。

热河蒙汉人民称胡匪为“耍人的”。来源主要是染有烟毒嗜好的劳动人民，不过也有民团中的乡勇和军队中的士兵，以及地主家庭的子弟，由于种种原因而走上此道的。三五成群的小胡匪，当地人叫做“地蹦子”，他们势孤力单，民团还可以对付；如果遇到立起“字号”的大胡匪，他们能成为几百甚至千余人的伙子，民团便须和他们交朋友，不敢采取敌对态度。热河各县的民团，完全由地主和一部分烧、当两行掌握。朝阳附近的地主所拥有的土地面积，虽然不如西拉木伦河以北以及察绥两省的大地主多，但是差不多都像王英的父亲王同春那样，在家中养有护院的“炮手”。并且他们互相联络勾结，结成很强固的“联庄”组织。“耍人的”因他们平日供给械弹和窝藏掩护，必要时，也纷纷前来“帮忙”，成了他们豢养的爪牙羽翼。朝阳的地主阶级结成集团来对抗官府。光绪年间，因为反对成立警察和创办学堂，都跟政府闹过事。民国年间由于反对铲除烟苗，经常把军警赶跑。汤玉麟统治热河时，曾激起朝阳的民变，几乎被羊山和二十家子的“联庄”和红枪会，把他的五弟汤玉书包围歼灭在朝阳县城。

朝阳的汉族“大家”（内蒙西部称大户）都有炮台，中等户也是好多家建有一个围堡。凡是他们对付不了的胡匪，均在里边窝藏。土默特右旗的王府，除了在黑城子经常驻扎着一百多“小队”，王爷收地租的“局子”以及旗官们种地的“青房子”（即窝棚），均有四五十个“炮手”保护。他们和汉族的地主一样，也包庇、收容立有“字号”的胡匪。至于土默特左旗、喀尔喀旗与库伦旗那里的王爷、旗官、牧主以及召庙的大喇嘛，不仅养有“炮手”和交结胡匪，并且和外蒙的哲布尊丹巴活佛和内蒙的巴布扎布“宗社党”勾结，受沙俄和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出过好多亡命徒。民国初年巴布扎布等“蒙匪”，在热、察、绥三省和科尔沁等部造成很大灾难。后来变为我的帮凶的田英（曾任伪蒙古军副师长）和胡宝山（曾任伪蒙古军团长）就是土默特右旗的人。田英于一九一三年参加外蒙军队，到过张北县以北二十里地的白城子。胡宝山在一九一六年巴布扎布战死林西之后，才到热河游击马队当了兵。据他们后来和我说，在这些“蒙匪”里，外蒙古人很少，大都是察哈尔和热河的蒙古人。由于以上原因，所以朝阳一县经常有十几营官兵驻防。二次直奉战争前，朝阳城里还设立着一个镇守使署。官兵开到朝阳，也不敢过于蛮干和硬剿，必须和民团、胡匪取得妥协，才能够站稳脚步。因而朝阳是官兵、民团、胡匪联成了一气，像三座大山压在善良百姓的头上。劳动人民不想做俯首贴耳的奴隶，就得挺身当打家劫舍的盗贼。失败的固然要杀头挨枪毙，立住“杆子”的便会升官发财。我就是成长于这样的环境里。

土默特右旗设治为朝阳后，王公、旗官、贵族据有大部分好地，山野完全卖给汉人辟为农田，给一般奴才分配的“户口地”很少。王公、旗官因为放垦时得到好多“荒价”，并且年年能向汉族农民收取“小租”，所以都过着腐化堕落的奢侈生活。贵族拥有大面积土地和好多奴才，也是饱食终日，吸食鸦片，多半活不到大的寿数。特别是王爷，以值班为名常年住在北

京，旗下的协理和“堂官”等大肆贪污，因而奴隶们除了遭受官府的苛捐杂税的压榨，经济上还有一层贵族的剥削。在本旗活不下去，出旗逃往外地的很多。土默特右旗的王爷，在北京西城的酱养坊占有一顷地大的一座府邸，里边有楼房假山和可以划船的小湖。日本投降后，“小王爷”沁布道尔济想卖给我，索价竟要六十万美金。

我们古力古畜大庙，共有一百多户人家，一半是蒙古人，一半是汉人。这五十多家蒙古人里边，姓赵和姓朱的三十多户，都是王爷的奴隶。地里所产的粮食，只够吃半年，缺短的口粮，必须以佣工和经商来换取。故姓赵的开着留人店和杂货铺，姓朱的给汉人和我家揽工。他们都是“穷蒙古”，只负担黑城子王府的差丁（因为从他们身上榨不出油水，只好服劳役）。我们李家由于祖先来自山东，子孙比较善于耕耘土地，收入稍微宽裕一点，故有过念书当了医生的。我父亲从小弯腰曲背，村子里的人，除过因为他舍不得花一文闲钱，给他起了一个“土包子”的外号，通常称他为“李罗锅子”，方圆几十里以内谁也知道。朝阳的土地面积讲“天”，一“天”等于十亩。在生我大哥的时候，我父亲已拥有三十多“天”土地，还有牛马和羊群（四五十只山羊），经常喂着十几口肥猪，还从几家破产的蒙古贵族手里买到一百多串“小租”。我家一面剥削给我们种地的三四个长工和几十个短工，一面也受外边各种势力的压迫、敲诈。

首先干扰我们生产和生活的是一个姓鲍的名叫色楞的贵族。因为他是我们家的“诺颜”（奴隶主），我们是他的奴才，我们姓李的全归他所有。可是他来到古力古畜大庙，不去找我的本家（由于从他们身上榨不出油水），专门吃喝我父亲李罗锅子。色楞台吉住到我家以后，每天须以好酒好肉和鸦片款待，临走时还要拿银钱和烟土，以及捉猪宰羊拉米驮面。那时我家不说土炮火枪，单是快枪已购到三枝。我几次想拿枪把这家伙干掉，可是我父亲不允许。他说：“诺颜杀了奴才可以不偿命，奴才杀了诺颜

得满门犯抄。”后来我父亲用两万串朝阳的“街市钱”（每百文折铜钱十六文），以一万七千串的整数，交给色楞台吉做了赎身的价款，用其余购买黑城子衙门的“档子房”，给发了和色楞台吉永远脱离主奴关系的执照。但色楞台吉仍不断来我家跌皮、耍赖，我父亲依然奴颜婢膝地对他表示恭维，一直把这个没有儿女的鳏夫供养到死。

我们由奴才变为“自由民”（达尔罕民）以后，很可以像别家蒙民编入朝阳的汉户，但是我父亲又怕亲戚乡里在背后批评，所以跑到北票山南面八里的下府，给土观活佛仓的喇嘛花钱，领了一张印票，变成了那个召庙的“庙户”。最初土默特右旗的王爷，就住在下府地方。此处在此牛河西岸，离我家五十多里。土默特右旗王爷修的这个召庙极为宏伟，里边有五百多喇嘛，附近的好地都归庙上所有，土观活佛的收入很大。属于庙上的“庙户”，只给捐献少数香钱即可，土观活佛每年“游旗”到各村给蒙民和他的庙户“净宅”时，也只收取一些随心布施，所以庙户比蒙户负担要轻。虽然这样，但是富裕庙户也得有人给“抗风”，否则仍然有人欺侮，遭受种种压迫。

我父亲已经不会说蒙古话，我母亲会说而不说。我家除了在院子中间有一根喇嘛给立的“玛尼”杆子，生活习惯礼节以及所供的神位和汉族的庄稼人完全一样。我有两个哥哥，大哥按照蒙古人的风俗，许在本村庙上当喇嘛。后来父母舍不得叫他去，就让我去顶替。我的乳名本来是那孙巴雅尔（长寿的意思），结果叫成了一个三喇嘛。古力古畜大庙在北往开鲁、南到义县的大路中间。我家是该村的首户，修建着院墙很高的大院，过往军队和商旅，都到我家的伙房中投宿。我家有三枝快枪，仅能堵挡“地蹦子”，但是打不了大胡匪，所以只好和他们交朋友。我七八岁时，胡匪经常拉着整车“肉票”在我家打尖住夜，我们杀鸡宰羊，用好酒好饭招待。到了称为“外八营”的直隶练军开到我村驻防，胡匪才绕开了古力古畜大庙。我从小就爱玩枪骑马，并且

喜欢和当胡匪与当兵的人接近，听他们讲那些过五关斩六将的经历。因为自己家中有枪有子弹，时常拿到山上打野兔。我十一、二岁时，射击技术就很不错了。我父亲怕我长大后给他生事惹祸，先是以四块银洋的束修把我送到村子里的私塾，念了半年《百家姓》和《三字经》。由于我经常逃学，又叫我带领长工，早起晚睡地做庄稼活，想把我培养成他那样守家过日子的地主。可是，我从小就想到外边广阔的天地去闯荡。我父亲对我没有办法，最后又企图利用女人把我拴住。在我十四岁那年，就给我娶了一个比我大七岁的名叫德力玛的蒙古老婆。

“庙户”不给土默特右旗负担差丁，但是由于我家的土地，大都是向汉族的种地户购买的“粮地”，所以和汉族的地主一样，得给朝阳区衙门交纳田赋，并支应地方上的其它差事。朝阳在宣统以前，各区就成立过名叫义务警察的民团。凡是有地十“天”的担任步警，有地三十“天”以上的担任马警，谓之“步户”和“马户”。我家有地三十多“天”，够上出马警的资格，最初是自备枪马，每年花三百多块银洋雇人到朝阳七区替我大哥当差。我娶过老婆之后，我父亲看见我成天在“外八营”的兵棚子里厮混，并不去田间劳动，索性叫我前去担任“马户”。我当了马警，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每跟小股胡匪作战，老是冲在前边硬打穷追，发出的子弹讲究必须要“吃肉”，我把杀人当成了儿戏，“地蹦子”们听见我很感头疼。我那时还不叫李守信，按我大哥李君、二哥李臣的顺序、教书先生给我起的官名叫李义。因为打了几个小仗很勇敢，“李义”便在民团、胡匪和官兵中间出了点名。连平顶山庙上的大喇嘛和黑城子衙门的协理，也知道古力古畜大庙的李罗锅子家中出了一个少年“炮手”。我父亲听见这些话以后，当然非常担忧，一面怕我“久走冰滩难免有滑倒”的一日；一面怕我跟胡匪结下冤仇给家中招来灾难。因此我当了几年“马户”以后，我父亲又雇人把我替回，以免我在外招风闯祸。

我回到家中，除了当“马户”时交结的朋友，不断前来找我，尤其是“外八营”在我村驻防时，有老板纪小辫部下的一个安大个子（即安静海，又名安占武，朝阳兆星沟人，汤玉麟时代任过经棚县公安局长），这时在朝阳北境当了胡匪，而且立起了“字号”，每次路过古力古畜大庙，总要到我家勾引我去入伙。同时朝阳县的警察、黑城子王府的衙役和过往的军队，路过古力古畜大庙时，因为我家富裕而无势力，老是连人带马住下大吃二喝，吃饱喝足抹嘴扬长走去。我忍受不下这种窝囊气，好几次想把他们赶跑，被我父亲阻止而未发作。我父亲看见我呆在家中也会生事，又想出了一个办法，让我到距家十七里的平顶山上去当喇嘛。平顶山庙上的当家大喇嘛姓白，是朝阳佑顺寺外号周仓喇嘛潘成的徒弟。潘成因到锦州搬兵平定金丹教有功，并且和毅军的宋庆、姜桂题、米振标等结交成朋友，后来成了热河的地方绅士。朝阳县官上任，必须先拜望潘成，才能坐稳。他的几个徒弟便借此横行乡里，成了朝阳乡下的恶霸。平顶山庙的白大喇嘛，又名罗旺喇嘛（罗旺是西藏语），我给罗旺喇嘛当徒弟就成了周仓喇嘛的徒孙，我父亲好借以支撑门户。另外罗旺喇嘛收我为徒，并不是给我传授经卷，因为他知道我很会打枪，是托人指名叫我前去给他保镖。我父亲便在我二十一岁那年，让我剃掉辫子到平顶山“出家”，做了成天背着手枪，伺候军官、地主和胡匪头子的蒙古小喇嘛。

平顶山庙是一个只有四十“天”和五十多个喇嘛的穷召庙。可是罗旺喇嘛的声势，却令人侧目。他跟“耍人的”与“官线上的”（内蒙西部称“官面上的”）都交往，热河和关东都有他的好朋友。在我们村里驻过防的纪小辫，跟他磕过头；当了胡匪的安大个子与以后给汤玉麟担任热河保安旅长的赵国增，是他的结拜弟兄。罗旺喇嘛背枪的徒弟，除了我以外，还有一个从小出家叫做吉祥的小喇嘛。此外雇有两个厨师，给他炒菜应酬四面八方而来的客人。由我们两个徒弟，从厨房到客房给端茶递水。他白天

给“官线上的”洗尘，黑夜给“耍人的”接风。有时这两方面的人碰到一起，就分别在两个院子里招待，双方都假装不知道，故发生不了冲突。朝阳、锦州和义县等处的大地主子弟和烧、当两行的伙计，被胡匪绑去以后，都得托他给“说票”。他仲裁出“赎价”，如果胡匪不买他的帐，可以调动别的胡匪和官兵去联合剿除。“说票”成功以后，地主和烧、当两行，以上布施和舍饭的名义，用金钱、烟土和粮食、牛羊对他进行酬谢。罗旺喇嘛每次出门，都是坐着带串铃的二骡轿车，我和吉祥骑着快马，一前一后跟着。我们除了背着一枝八米厘长枪，还挎着一枝德国造“自来得”手枪。朝阳、锦州和义县的商号老板，听见他的串铃轿车从街上走过，多从柜台上出来拱手迎接，称他为“喇嘛爷”。朝阳、锦州和义县的县官出门，也不如他威风。

我给罗旺喇嘛当了二年多“炮手”。在这期间，可以说大开了眼界。不仅跟许多“耍人的”和“官线上的”人混熟，并且知道了不少为匪做官的门径、道路与诀窍。认识到当时的世道，原来就是这个样子：只要自己有一套“本领”，得到一帮子人的拥护，就可以为所欲为，扬眉吐气。因此我跃跃欲试，很想自己也创立一个“字号”。我那时就懂得了交朋友的重要，用小恩小惠去拢络他们，让他们做为自己的工具。那时候，每年有好多人给庙上上布施和舍饭，但是除了我和吉祥而外，其余的那些小喇嘛，每天早上只有仓里给发一碗米，连老腌菜和大酱都没有。罗旺喇嘛没有客人前来的时候，即到平顶山底下的头道营子，以“回娘家”为名，由吉祥在外边站岗，去和一个蒙古寡妇睡觉。我利用这一空隙，拿枪给小喇嘛们打野兔吃肉，他们当然对我非常拥护。罗旺喇嘛人很聪明。现在回想起来，他总是看见我野心勃勃，恐怕留在身边闯下大的乱子，当我二十三岁那年，说我随便打野兔杀牲，不能当佛门弟子，遂婉言把我辞退，并且把我介绍到黑城子王府，给他的朋友、衙门管印的协理富巴什当了“炮手”。

黑城子因为王府修建着一座黑压压的大土城而得名。城里除

了王府和衙门，便是王公、仕官所开的商店买卖。城门洞像张大的血口，吮吸着朝阳城北蒙汉人民的精髓。王爷每年夏天从北京回来避暑，带着一班京戏艺人在王府享乐，不肯轻易出门，公事全交给这个掌印协理去办理。富巴什在城里有一处大院，里边还套着一个小院，大院中好多奴才给他铡草喂马，推碾围磨，他在小院中和老婆头对头抽大烟。富巴什在城外有四五处“青房子”，土地达好几千“天”，每年收租在万石以上，粮食堆积如山。他除了指挥旗下的“小队”，身边经常有四个“炮手”保护。由他家到衙门只有百十步地，也要乘坐轿车，让我们在前后跟着，做他的“顶马”。他在“档子房”办公时，我们得在门房中呆着。我那时已经长硬翅膀，如何能当这分“穷差”，所以干了三个多月，便把手枪扔给他跑回家中。那年我父亲整整七十岁，我看见他风烛残年，由于我二哥病故终日啼哭，故不忍扔下他远走高飞。到了一九一七年，我父亲七十三岁逝世，我再没有牵挂和管束，翌年我二十七岁时，即被安大个子叫到朝阳的邻县建平，参加了亦官亦匪的热河游击马队。因为安大个子和赵国增等，被熊希龄的同乡张协堂收抚，在那里都当了军官。从此我就跑到外边闯荡江湖，逐渐走上了直接危害人民的反动道路。